

知识的视野与思想的视野：

# 明清哲学高端论集

吴根友 主编



岳麓書社

知识的视野与思想的视野：

# 明清哲学高端论集

---

吴根友 主编



岳麓書社·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视野与思想的视野:明清哲学高端论集/吴根友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7.12

ISBN 978-7-5538-0839-0

I. ①知... II. ①吴...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B248-53②B2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4950 号

ZHISHI DE SHIYE YU SIXIANG DE SHIYE

MINGQING ZHIXUE GAODUAN LUNJI

## 知识的视野与思想的视野:明清哲学高端论集

主 编:吴根友

责任编辑:刘 文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罗志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67 千字

ISBN 978-7-5538-0839-0

定价:49.00 元

承印: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序 言

吴根友

001

这本论文集是明清哲学高端论坛“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里的明清哲学研究”部分参会论文的结集，文集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很难“一言以蔽之”是关于什么主题的论文集。但在方法论上，却贯穿着比较哲学的方法与视野。近十几年来，我在做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视野”之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故当时以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为明清哲学研究的双眼，以拓展现当代明清哲学与学术研究的领域。

作为学者，一生都要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增加新知识，不断学习、吸收新思想。我把此两件事情提升为一种学术化的表达，即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所有的新思想都是知识，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直接地、现成地属于思想。不过，就现代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一些新的知识经过量的积累，会慢慢改变我们对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新知识的增加有益于哲学思想的改变。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总是与新的知识体系有关。哲学与宗教、艺术的思维不同，它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追求清晰与明白。而在认知上达到清晰与明白，就必须将认识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宗教与艺术，有时要依赖于直觉。但作为理性思维的典型形式，哲学思维主要依赖于理性认知。即使是哲学上的直觉，也是依托哲学理性思维之上，然后超越理性思维的结果，傅山将老子“绝学无忧”一句中的“绝学”理解为“绝河”之绝，即经过而超越，可以作为哲学思维中的直觉与理性关系的一种妙解。否则，哲学的直觉就与痴人说梦没有什么区别了。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哲学理性思维不只是单向度地依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认知，它同时也依赖

于人类社会的实践知识与理论总结。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不断地刷新着传统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相较于西方传统社会哲学而言，重大社会实践与变革对于传统中国哲学思维的改变往往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出现的质的变化，似乎只有“周秦之际”的历史时期及其出现的思想变化可以与之相媲美。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一些新思想、新社会秩序的萌芽状态都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明清之际”，是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内容的，它就是指明代万历到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历史时期，大约三百年的历史时间。学术史上与之相适应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周秦之际”，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即是指春秋末到秦统一六国为止，大约有五百年时间。这两个“之际”都是中国历史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其社会现实与思想界的具体倾向都表现为“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的一种纠缠状态。周秦之际主要表现旧的诸侯贵族与新的地主、军功之士之间的斗争，政治上则表现为西周的封建制与六国中正在形成的郡县制之间的斗争。最后是地主、军功阶层的胜利，郡县制成为主流政治，封建制退为次要的补充性的制度。明清之际则表现为旧的以地主官绅为基础的皇权官僚专制政治向着以工商业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与技术精英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过渡，其简明的表述方式则为早期现代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他们要用商业的计算理性与手工业的技术理性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理性与品级社会制度。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思想运动的角度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早期思想启蒙”时代。由于“明清之际”经历了两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与西方开始大范围的经贸与文化接触；一是以清代明的巨大政治动荡。而这两件事情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又是长期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与学术变化，就显得格外的困难与复杂。至今，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想的具体认识与具体结论，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大的耐心与更开阔的知识与思想的视野来研究这一复杂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思想现象。

以萧萐父先生为代表的珞珈中国哲学，在重视中国哲学的全面性、整体性的同时，对于现代新儒家、出土文献中的哲学思想、明清之际哲学

等领域尤为关注，特别是对明清之际哲学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学术领域。本论文集在坚持“明清早期启蒙说”的思想前提下，更加重视明清之际学术与思想的复杂性，对于此领域研究中的“一得之见，相反之论”，均给予高度的重视，以异贞同，求同存异，从而展现历史变化、发展的方向性与多元性、丰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在经过近百年的浴火重生后，要实现现代化的华丽转身，重新回到世界文化的主流位置，就必须要认真研究属于自己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而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思想的研究，是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明清之际已经出现的五教（儒、道、释、伊斯兰、耶）并存而融通的思想、文化局面，以及相互竞争与融合的思想经验，对于今天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与融通，亦将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

是为序。

# 目 录

- 儒家学说与德国早期启蒙运动 ..... 李文潮/001
- 徐光启与明清之际后理学思想世界的重建 ..... 陈卫平/025
- 论王畿对理学人性论的改造与重建 ..... 王国良/038
- 李贽论“礼” ..... 金惠经/047
- 陶望龄对良知之“无”的阐发 ..... 龚开喻/059
- 论焦竑的三教会通思想  
——生死关切为出发点 ..... 罗贵斌/076
- 泰州学派罗近溪著作关联之初厘定 ..... 程海霞/087
- 从《心学宗》看方学渐的学派归属问题 ..... 张永义/100
- 明代文人的焚香雅事及其意蕴 ..... 刘 耕/110
-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  
——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 连 凡/127
-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 蒋国保/144
- 方以智物哲学的方法论特色 ..... 邢益海/161
- 易学哲学视野下的方以智圆·思想探析 ..... 廖璨璨/182
- 王夫之与后理学时代的人性生成论转向 ..... 陈 屹/197
- 王船山易象义简释 ..... 王林伟/218
- 黄宗羲对王门良知说及“四句教”的诠释与修正  
——兼论黄宗羲的心学立场及其对心学发展的贡献

.....	姚才刚 王琦/232
戴震的名学与认识论思想简论 .....	吴根友/246
从“胜国遗闻”到“以史解经”	
——章学诚释经学方法的兴起.....	王晨光/258
黄以周礼学思想探析	
——以《经训比义》为中心 .....	任慧峰/271
严复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评判与改造 .....	孙汉生/293
清末革命派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采借与转化 .....	彭传华/310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文化认同	
——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崔海亮/327
近代中国的知识进化论及其反思 .....	黄燕强/341



## 儒家学说与德国早期启蒙运动

李文潮

明末清初<sup>①</sup>，欧洲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发现了中国。随着天主教特别是其中的耶稣会传教活动在东方的进展，中国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越来越受到欧洲精神界的关注。<sup>②</sup>事实上最晚到了17世纪初，对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欧洲已经有了详细的第一手的资料：从历史、风俗习惯、中国学者文人的嗜好怪癖、神秘的汉语、图画一般的中文、瓷器的绚丽、多妻制的诱惑、溺杀女婴的罪恶、儒家的经典、道家的长生不老丹、针灸脉经、风水八卦，直至长城的高度宽度。把这些单一的报道拼起来，便出现了一幅有关中国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图画，一幅与哥伦布发现的土著美洲完全不同但同时又相得益彰互对互补的景象：这里是与欧洲文明匹配甚或在某些领域领先的千年古国，那里是风光奇异的原始的尚未开化的质朴。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甚或到现在），这两个遽然不同但又互补互映的视角与主题将是欧洲评价与想象非欧社会与文化的两只极有力的翅膀。<sup>③</sup>

①文中第一以及第四部分中的主要内容曾以《不识吾主亦可幸福？》为题发表在吴根友主编的《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一书中。参见：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M]。吴根友，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1-126。

②参见：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时代的巡礼与反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③URS BITTERLI. Die “Wilden” und die “Zivilisierten” : Grundzüge einer Geistes-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überseeischen Begegnung [M]. 3rd ed. München (Beck), 2004.

这一系列发生在“他乡”的文化发现不可能不反馈到“本土”产生影响。欧洲各式各样的学界人物对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的激烈争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而其中作用相当深远的一点是欧洲对孔子之人格及学说的接受与评价。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内，被中国人（甚或整个亚洲人）奉为道德表率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这一名字给不少在华传教士以及他们在自己本土的读者带来了一个困惑而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异教徒们的道德问题，亦即这些并不认识基督福音的人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的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夫子等非基督教哲人们在自己的学说与生活中显然体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其灵魂理应得到基督教意义上的拯救；但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则无疑等同于承认没有基督福音个体亦可幸福生活。<sup>①</sup>而建立在孔子学说之上的据说数千年一直稳定平和的儒家国家体制则是对基督教关于（基督）信仰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的一大挑战<sup>②</sup>，迫使欧洲基督教学者对这一国家体制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要么承认人类理性完全可以独立于（基督教）宗教信仰而自主存在，要么承认所谓的“自然神学”<sup>③</sup>。而对于基督教所自称代表的“天启”宗教来说，与理性自主一样，“自然神学”同样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实际上到了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考察西方对中国的诠释中仍然不难看到当时使用的某些模式、偏见以及误解遗留下来的影响与痕迹。

①STOLLE G. *Historie der Heydnischen Morale* [M]. Jena: Pohl, 1714.  
Franciscus de la Mothe le Vayer, *De la Vertu des Payens* [M]. Paris: Sommaville, 1642.  
第二版, 1647.

②LE COMTE L.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M]. Paris: Jean Anisson, 1696 (II): 119; Li Wenchao. *Die christliche China-Mission im 17. Jahrhundert, Verständnis, Unverständnis, Mißverständnis* [M]. Stuttgart: Steiner, 2000 (= *Studia Leibnitiana Supplementa* 32): 342-345.

③就其概念讲，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是经院哲学高峰时期出现的。首次使用这个词的是个叫作莱蒙杜斯·撒蒙杜斯（*Raimundus Sabundus*）的西班牙人。此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Theologia naturalis*。作者享有身后之誉，因为到了15世纪的下半叶，这本书才引起轰动，相继被译为多种文字。这个概念的内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每个人，只要他愿意仔细地观察一下自然界以及自然界的运动，均可依赖自己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的智慧，同样表现在世界的运转与自然规律中。这当然同时意味着，这是第二点，在宇宙中万物不但有其作用因，亦有其目的因，所有一切都是按照一定的计划互相联在一起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意欲把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限制在德国启蒙运动早期上，主要目的是介绍德国当时的四位思想家对孔子其人及其学说的不同阐释。他们是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90—1753）以及毕尔封格（G. Bernhard Bilfinger, 1693—1750）。

## 一、介绍孔子及其学说的两部巨著

为了招募新的传教士、争得罗马方面同意使用汉文在中国举行宗教礼仪，受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委托，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作为中国副教区的代理人在后来将在伦敦帮助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研究中国文字语言的华人沈福宗的陪同下于1681年返回到欧洲。在柏应理一行的行李中，据说有400多本在华传教士们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作为送给梵蒂冈图书馆的礼物；另外还有大量的手稿，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欧洲得到出版发表，其中包括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拉丁文，1687年刊印）<sup>①</sup>、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葡萄牙文，法文版1688年）<sup>②</sup>、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拉丁文，1686年刊印）等等。1682年10月，柏应理一行在荷兰登陆，在安特卫普，柏应理多次与巴勃布罗赫（Daniel Papebroch, 1644—1714）会谈，此人是《圣者档案》杂志（Acta Sanctorum）的主编，与莱布尼茨保持着频繁的书信来往。在巴黎和柏林等地，柏应理结识了另外一些对中国有研究或者感兴趣的人士，其中包括1685年来华传教的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巴黎皇家图书馆馆员特维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法国学者皮克（Louis Picquet）、编辑出版《中医事例》的医生克莱尔（Andreas Cleyer）、德国选帝侯威廉的宫廷医生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以及对中文汉字颇有研究的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等人；在柏林，柏应理还拜见了选帝侯威廉，通过耶稣会士、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茨（De La Chaise）的引荐，于1684年9月15日在凡尔赛宫拜见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据说路易皇帝表示乐意大力支持柏应理实现自己的诸多计划。以报道宫廷消息秘闻见长的法国《优雅信使

<sup>①</sup>魏若望. 南怀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sup>②</sup>安文思. 中国新史[M]. 何高济, 李申,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

报》(Mercuré Galant)当即在9月号上以书信的形式专门报道了此事。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学者共和国通讯》(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页428-429)则在1686年的4月刊登了有关柏应理的凡尔赛之行的详细消息。

柏应理欧洲之行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是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刊印<sup>①</sup>，从而完成了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们数十年来的一个梦想。这部长达550页的献给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大开本精装羊皮书囊括了儒家“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三书的拉丁文翻译(共267页)。长达95页的《引言》之后是一幅精美的孔子画像(页116)和一份详细的《孔子生平》(页117-124)。正文之后是柏应理撰写的《中国古代君主世系》(共8页,载黄帝以下2457年间的86位帝王世系)以及一年前已经单独发表过的记载公元前2952年至耶稣诞生后1683年的《中国历史编年》(共125页)。尽管如此,这部巨著只是原有手稿的一部分。1706年,曾在巴黎皇家图书馆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一位名叫埃蒙(Jean Aymon, 1661—约1734)的法国人携带了该馆收藏的大量手稿逃往荷兰。在1713年撰写的一篇刊登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学者杂志》的书评中,埃蒙声称他手中有长达900页的柏应理1687年刊印《孔子》一书的手稿,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出版一个澄清事实真相的“全本孔子”,因为刊印巴黎本的耶稣会士们删去了手稿中的整整三分之二。<sup>②</sup>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问世后,欧洲的各大学术杂志均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与评论,譬如英国皇家学会刊物《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87年,第189卷)、法国皇家科学院刊物《学者通讯》(Le Journal des Sçavans, 1688年,页99-107)、上面提到的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学者杂志》(Acta eruditorum, 1688年,5月卷,页254-265)、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万有与历史图书》(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sup>①</sup>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 Patrum Societatis Jesu... Adjecta est Tabula Chronologica Sinicae Monarchiae ab hujus Exordio ad haec usque Tempora, Paris: Hortemels, 1687; 参见: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8(2).

<sup>②</sup>Acta eruditorum. Leipzig, 1713(1): 46-48.

卷7, 1687年, 页387-455)、同样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文学界新消息》(*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1687年8月, 页910)、荷兰鹿特丹的《学者著作史》(*Histoire des Ouvrages des Savants*, 1687年9月, 页65-79)、意大利帕尔马出版的《文学通讯》(*Il giornale de ' letterati*, 1687年, 页163-166)以及下面将要论述介绍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锋学者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在自己编撰的新书评论杂志《月谈》1689年8月号上发表的尖锐批判。

耶稣会在介绍儒家学说即中国文化方面的另一贡献是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刊印的《中国六经》<sup>①</sup>, 编译者是在中国生活居住了25年之后于1708年回到欧洲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除了“四书”之外, 这部拉丁文著作中还收录了《孝经》和朱熹的《小学》。与印制精美的巴黎《孔子》相比, 卫方济的这部《六经》朴素无华。更明显的不同是, 除了5页前言、20页目录兼索引以及两页勘误外, 剩下的就是长达608页的译文。尽管在1783年至1786年间被译为法文陆续出版<sup>②</sup>, 这部书的影响似乎不如前者大。从现有资料看, 出版过程好像也很平淡, 问世后除了上面提到的后来的翻译外, 似乎只有将要详细讨论到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莱比锡的《学者杂志》发表过一篇详细报道。<sup>③</sup>1700年左右在欧洲本土开始爆发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所谓的“礼仪之争”明显地妨碍了这一著作的传播, 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欧洲对儒家学说的兴趣在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降温。

尽管如此, 从德国学者蔡特勒在1732年至1754年间编撰出版的64卷本《百科辞典》中可以看出直到18世纪中期这两本著作对欧洲知识界的影响。蔡特勒写道: “这是两本引起轰动的辉煌巨著, 所有的真理都建立在

①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nimirum Adulorum Schola, Immutabile Medium, Liber Sententiarum, Memcius, Filialis Observantia, Parvulorum Schola, e Sinico idiomate in latinum traducti a P. Francisco Noel Societatis Jesu missionario* [M]. Prag: Kamenicky, 1711; 参见: 潘凤娟. 卫方济的经典翻译与中国书写: 文献介绍 [M]. 编译论丛. 台北: 台北编译馆, 2010, 3(3): 189-212.

② 前引潘凤娟. 卫方济的经典翻译与中国书写: 文献介绍 [M]. 编译论丛. 台北: 台北编译馆, 2010, 3(3): 198.

③ *Acta eruditorum*, 1712(3): 123-128. 1712(5): 225-229.

这两部书之上。”<sup>①</sup>再过大约半个世纪后，黑格尔在当时的柏林大学讲授哲学史时论述到这两大拉丁文巨著时，将告诉他的听众们假如没有这样的翻译，孔夫子的名声也许会好些。<sup>②</sup>就连孔子一名的写法也变了：令人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的拉丁化了的“Confucius”成了不带任何意义也不会引起任何美好联想的直接一对一的拼音“Konfutse”。

研究两个译本在翻译风格、选词、解释等方面的异同，应是有待学界完成的一项有意义但也很艰巨的任务。对于这里的讨论，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柏应理的巴黎本与卫方济的布拉格本中间相隔24年，时间不算长，但变化似乎很大：柏应理的译文基本上是沿着利玛窦的老路走，坚持认为中国经典中所说的“天”相当于甚至可以说就是基督宗教中所说的“主”，即“上帝”；而卫方济的布拉格译本却比较“忠实”原文，对“天”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后来仔细研究过两个译本的沃尔夫曾说，巴黎译本的作者们“竭尽全力地试图证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崇拜了真正的上帝”，卫方济却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中文中的‘天’”。<sup>③</sup>不过这是后话，也是不可全信的一家之言。譬如费赖之就认为：“方济不但翻译本文，而且选译注疏，得谓孔子与孔门诸子之说，翻译较为完备者，诚无过于是编。但亦有弊，方济对于本文不明者，辄以己意解释，隐讳者为之补充，有时反失原意云。”<sup>④</sup>

## 二、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家孔子》

柏应理的《孔子》问世之前，对中国一直感兴趣的莱布尼茨就已经得

① ZEDLER J H. Gross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 Lexicon all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M]. Halle, Leipzig, 1732-1754, 重印: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61-1964 (37): 1627.

②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1卷 [M]. 贺麟, 王大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20.

③ WOLFF C. 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Rede über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der Chinesen [M]. Michael Albrecht. Hamburg: Meiner, 1988: 145.

④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M]. 冯承钧,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420.

到了有关消息。<sup>①</sup>早在1687年1月26日，上面提到的巴勃布罗赫就在一封信中告诉莱布尼茨柏应理准备出版《孔子》一书。<sup>②</sup>收到巴勃布罗赫的信后，莱布尼茨把自己所藏的一本“孔子书”的开头部分（很可能是草描下来）寄给了巴勃布罗赫。至于是什么样的一本书，莱布尼茨在信中没有具体说，但他接着写道：“但愿柏应理神父能有可能与机会，在拉丁文翻译中附上相应的中国文字，因为也许有一天人们有可能猜透其中某些文字的字源亦即发现掌握某些文字的秘密。尽管我不敢真的相信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米勒]所作出的承诺，但我毫不怀疑，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从中国文字中剥离出其中的简单符号，对其进行确定，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原因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个（简单符号）表也许对理解由其组成的复杂符号非常有用。”<sup>③</sup>从上下文关系来判断，莱布尼茨寄给巴勃布罗赫的应该是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的《中国人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这本流传相当广泛的实际上只有部分《大学》译文的小册子曾多次再版<sup>④</sup>，但只有在中国（建昌、杭州）和印度（果阿）刊印的两个版本是双语本，即拉丁文与中文。法国学者特维诺1672年在其《游记杂志》第4卷（*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中整理的《中国学说或者孔夫子的书》（*La science des Chinois ou le livre de Cum-fu-cu*）只在封面上有几个中国字。而米勒声称自己找到了掌握中文的“钥匙”，但又不愿将其发表，据说死前竟将自己的研究手稿付之一炬。<sup>⑤</sup>

1687年4月1日，巴勃布罗赫给莱布尼茨提供了进一步的消息。按照巴

①李文潮. 莱布尼茨与中国[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 李文潮, 张西平, 主编; 梅谦立, 杨保筠,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②LEIBNIZ G W.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M]. Darmstadt, Leipzig, Berlin: Akademie, 1923-: A I, 7, Nr. 541. (引用方式: 罗马数字表示系列, 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数、页数或文献编号。下引本书, 均采用这一格式)

③A I, 7, Nr. 517.

④LAMBECIUS P. Commentariorum de augustissima Bibliotheca Caesarea Vindobonense [M]. Wien: Cosmerovius, 1665-1679 (5): 418; 1665-1679 (7): 349.

⑤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 李文潮, 张西平, 主编; 梅谦立, 杨保筠,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04-116.

勃布罗赫的说法，柏应理将在4月中旬完成《孔子》的刊印工作，然后将接着前往罗马；当他问陪同柏应理的中国人（沈福宗）柏应理准备刊印的书书名是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孔子的道德哲学”；不过尽管已经给文本中加入了数个汉字做实验，一个莱布尼茨所希望的双语本还是无法实现的。<sup>①</sup>在出版的《孔子》一书中的《大学》译文开始，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编辑者在某些关键性的拉丁文词语的右上方所加的“1”“2”“3”之类的编号。这些编号本来是用来对应附在书尾的汉字的。中文没有附上，这些编号却留下来了。同年7月22日，巴勃布罗赫告诉莱布尼茨，柏应理的书已经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正文之前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引言。<sup>②</sup>

柏应理的《孔子》一书集耶稣会士几十年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之大成，可以说是当时有关中国文化的更全面亦最好的资料选辑。除了《论语》《大学》《中庸》的翻译外，亦涉及了中国历史、中国的宗教与习俗特别是儒家哲学及其流派等等；尽管如此，《孔子》一书未能满足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好奇，也没有促成他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我想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再全面权威的这方面的著作也无法涵盖莱布尼茨的兴趣，无法满足他的期望或者说理想即幻想；二是柏应理的《孔子》中确实几乎没有莱布尼茨当时感兴趣的资料。可惜的是，这并不是说编撰翻译这本书的作者们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而是在刊印《孔子》时，出于多种原因，柏应理恰恰舍弃了可能会引起莱布尼茨极大兴趣的这一部分，譬如那份长达17大张的《论中国文字》（*Digressio de Sinarum Literis*）。在此之前，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以及米勒等学者就曾经使用过这份手稿，但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促使编辑者错误地认为没有必要将其发表。

1687年年底，莱布尼茨路经法兰克福，在这里的一个书店里看到了从巴黎寄来的《孔子》一书。在12月9日写给恩斯特公爵的信中，莱布尼茨写道：“这是一本我长久以来渴望看到的书，今年在巴黎发表。书的内容是中国哲学家之王孔夫子的著作，不过不是孔子亲自撰写的，而是由他的学生们收集整理而成的，因此只有部分是孔子亲口说的。从其生活的年代来

①A I, 7, Nr. 525.

②A I, 7, Nr. 542.



看，孔子几乎早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哲学家。书中有不少非常精辟的思想和格言，且经常使用类比譬喻，比如有一处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同样，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论语·子罕》，后半句是注疏，见朱熹《四书集注》）可以看出，书中翻译过来的儒家原著并没有受到莱布尼茨的特别关注。除了强调孔子学说的古老外，引起莱布尼茨兴趣的是附录中的《中国古代君主世系》。他接着写道：“附在书尾的《中国编年史》非常值得重视，因为按照这一计算，中国的最初几位帝王，如伏羲以及黄帝等，在位执政的年代非常接近大洪水发生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一点将迫使我们放弃《圣经》的希伯来译文，而接受70子希腊译本。”<sup>①</sup>在5年之后，1692年3月21日，写给闵明我的信中，莱布尼茨再次指出：“您的同会兄弟柏应理……让我们初步尝试了原原本本的中国历史，不过与其说是他满足了我们需求，还不如说他激起了我们的更多的渴望。”<sup>②</sup>德国下萨克森州图书馆保存的《孔子》一书不是莱布尼茨后来使用过的版本，不过对图书馆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每逢重要的事情，图书馆需要展示自己的宝藏时，这本书通常就要被拿出来放在玻璃柜中供人们瞻仰，在这本书前言的末尾，有人在柏应理的名字下面用拉丁文写了“牛皮家”一词。而莱布尼茨提到的中国编年历史的重要性，则涉及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非常严肃但也非常有趣的争论。按照当时的权威专家、英国主教乌舍尔（James Ussher）在其《旧约与新约中的纪年》<sup>③</sup>一书中的计算，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1656年后即公元前234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大洪水，人类遭到毁灭，洪水后大约100年，由诺亚一家发展出来的新的“全人类”开始建造巴比通天塔。在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其《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把伏羲的执政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952年。此书1658年在慕尼黑发表后，正式导致了关于《圣经》纪年与中国上古史之间的矛盾争论，从而也导致对中国文献的可靠性以及对《圣经》的批判性研究，因为假如中国的编年史是可靠的，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洪水只能是局部性。按照希腊文本的《圣经》，则可以上帝创世的时间大约提前数百年，便可以相

①A 1, 5, Nr. 9.

②A 1, 7, Nr. 348.

③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M]. London, 1650.